

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赵学功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核武器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不仅在战后初期坚持核保密政策,而且还多次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出让步,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地位,对苏联构成有效的威慑,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核力量的建设,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使双方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而使得美苏决策者都认识到,限制核军备竞赛对双方至关重要,美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冷战 美国 苏联 核武器 核军备竞赛 核威慑

核武器虽然并非冷战的产物,但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将核武器视为一张威慑苏联的王牌,为谋求并保持核优势,不断扩大核武库的规模,提高核武器的质量,使得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将整个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另外,美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

* 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300350)

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庞大的核武库并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因而，限制核军备竞赛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内容。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成果颇丰。^①国内学界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相关成果不断涌现。^②鉴于这一问题极为复杂，本文只能对其中某些方面进行非常简要的探讨。

一、核武器与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基于共同的战略需求结成同盟，但美国领导人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敌视和猜忌依然存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认为，“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从1941年起便充斥于华盛顿官员们的头脑。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美国人从未放弃其自1917年甚至更早就存在的对苏联的疑虑。^③不仅如此，随着战局的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担忧与日俱增，并将苏联视为未来最主要的手和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坦承，“国务院的官员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谈论着来自苏联的危险这一话题；而到了1944—1945年的冬天，随着胜利日的临近，这一话题更是成为华盛顿的主要议题”。^④因而，在原子能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坚持垄断地位，拒不与苏联分享核秘密。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签署了双方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进行全

① 近年出版的相关代表性论著主要有 David Tal, *US Strategic Arms Policy in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17; Matthew J. Ambrose, *The Control Agenda: A History of 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Brendan R. Green, *The Revolution That Failed: Nuclear Competition, Arms Control, and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Fred Kaplan, *The Bomb: Presidents, Generals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0; Sean M. Maloney, *Emergency War Plan: The American Doomsday Machine, 1945-1960*, Lincoln: Potomac Books, 2021.

② 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可参见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汪洋主编：《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顾德欣：《核裁军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姜振飞：《美国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詹欣：《冷战与美国核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张杨：《冷战时期美国的太空安全战略与核战争计划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相关论文主要有戴超武：《原子弹与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核战争的设计》，《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白建才：《试论核武器在冷战发生、发展和结束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刘磊：《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核战争的设想》，《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马晓云、刘磊：《核军控的动力考察：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高恒建：《1969—1972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

④ Louis Halle, *The Cold War as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 38.

面合作的协议,其中,明确规定没有双方的同意,不得与第三方交流任何有关原子能的情报。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第三方指的就是苏联。1944年6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美英控制苏联疆域之外的钍和铀矿资源达成协议,据此双方成立“联合开发托拉斯”,负责这些资源的勘探、开发等工作,并计划到战争结束时控制全世界90%的优质铀矿资源。9月,双方又签署了一项秘密备忘录,明确规定向世界各国通报原子弹研制进展情况以便就其控制和使用达成国际协议的提议是“不可接受的”,应继续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视为“绝密”;在击败日本之后,为了商业和军事目的,美国和英国将继续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直至双方同意终止。美国负责“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曾言,“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苏联。^①

杜鲁门执政后延续了罗斯福的核垄断政策,并将核武器视为实现其外交和政治意图的重要工具。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不少官员及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们不断告诫说,美国的政策只会导致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引发一场核军备竞赛,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建议尽快向苏联通报有关“曼哈顿工程”的情况,加强与苏联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但杜鲁门坚持认为,美国应坚守核秘密,苏联必须至少在东欧及中国东北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才能考虑与之分享核秘密。正因为如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真正意图是要对苏联进行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一场“新的甚至是更可怕的毁灭性战争”,美国的核垄断使苏联的安全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促使苏联决定进一步加快原子弹的研制。^②

战后初期,核武器成为美苏关系中一个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问题。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认为,在核问题上应尽早与苏联进行接触,拟定控制核武器的办法,以避免双方走向核军备竞赛,从而危及战后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担心,如果美国在核问题上坚持排他性政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却固执己见,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任何有关原子弹的研究、设计、生产过程及军事上的使用等信

① Leslie Groves, *Now It Can Be To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141.

②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k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2.

息的泄露。他还多次公开强调,决不会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弹制造过程的信息。^①

为了阻止苏联研制核武器,美国试图将苏联的原子能计划纳入国际管制之下。美国决策者认为,作为一种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原子弹必须置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只有美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美国提出的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旨在维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确保美国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② 苏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意在企图“统治世界”,要求禁止一切核武器的生产,并完全销毁现有的核武器。毫无疑问,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疑虑,这也是导致美苏战时同盟瓦解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核打击与核威慑

美国的一些冷战史学者认为,战后苏联之所以要极力加强其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源于其长期的“不安全感”。^③ 实际上,缺乏安全感的恰恰是当时美国的军政官员。在他们看来,为了消除苏联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美国享有的核垄断地位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彻底消灭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和工业基础,并进而推翻苏联政府。^④ 核武器由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决策者认为,未来与苏联的战争必将是一场全面战争,核武器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就摧毁苏联所有重要城市所需要的原子弹和前沿基地的数量进行估算。^⑤ 1945年11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就“苏联对有限战争的战略脆弱性”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定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1946年1月初,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建议,美军轰炸机从前沿

^① James F. Schnabel,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45-1947*,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96, p. 116.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Disarmament, 1945-1959*, Vol.1, Washington, D. C.: GPO, 1960, pp. 7-16.

^③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 Russell D. Buhite and WM.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 Summer 1990, pp. 367-384.

^⑤ Raymond P. Ojserkis,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 S. Arms Build-Up*, Westport: Praeger, 2003, p. 14.

基地出发,向苏联投掷 196 枚原子弹,旨在给苏联进行战争的工业基础以毁灭性打击。6 月,美国军方拟就了代号为“铁钳”的计划,确定对苏联 20 个重要城市投掷 50 枚原子弹,以摧毁苏联工业,彻底瓦解其交通与通讯系统,击败苏联,或至少迫使其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投降,并最终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占领铺平道路。^① 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军方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对苏作战计划,扩大了核打击的规模,认为只有给苏联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才能瓦解其斗志,促其早日投降。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包括行政中心、重要城市和工厂,其次是交通枢纽、发电厂以及油库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的 70 个城市和工业中心投掷 133 枚原子弹。^② 为威慑苏联,美国将 60 架 B-29 轰炸机派往英国。实际上,这些轰炸机都没有经过改装,并不能携带核武器,美国不过是虚张声势,但美国就是要给人造成打算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的印象。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故意暗示这种轰炸机载有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0 号文件强调,“决不应当让苏联有丝毫的幻想,以为美国在必要时也不会考虑对其使用核武器”。文件规定,一旦发生冲突,为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军事部门必须迅速并有效地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武器,并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③

美国决策者确信,美国的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迫使苏联不敢对西方的空运行动进行干涉,并最终解除了封锁。杜鲁门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肯定认识到,美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因而,威慑的影响力要比以前更大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拥有了核武器,苏联可能早就占领整个欧洲了。一些美国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对美英的空运采取任何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核轰炸机所起的威慑作用,苏联主要的城市和工业中心都处于这些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④

即使在 1949 年 8 月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之后,美国政府也并未因此而停止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认为苏联虽然拥有了原子弹,但数量不会很多,而

① Michio Kaku and Daniel Axelrod, *To Win a Nuclear War: The Pentagon's Secret War Plan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pp. 34-35.

② 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6, No.1, June 1979, pp. 70-71.

③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79; *FRUS*, 1948, vol.1, p. 628.

④ *FRUS*, 1948, Vol.3, p. 281;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110; 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p. 260.

且缺乏运载工具,不足以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享有的优势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以摧毁其进行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并阻止其占领西欧。这一时期美国军方制定的计划是要用220枚原子弹攻击104个苏联城市。^①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就对苏政策展开秘密研究。该小组提出了四种方案,除第一种方案建议继续坚持遏制政策外,其他三种方案都要求对苏采取强硬态度。第二种方案强调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决不允许其再向前迈出一步,否则,美国将不惜诉诸一场全面战争,尽一切力量将苏联击败。第三种方案认为,美国不可能与苏联长期共存,应想法彻底将其消灭,从而“结束铁幕的存在”。第四种建议主张,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其接受美国的条件,如遭拒绝,美国将对其发动全面战争。^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强调,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要使苏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欧洲盟友遭到苏联的攻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予以回击。美国军方显然对此并不满足。1954年3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份旨在“消灭一个国家”的“基本战争计划”,要求在苏联有足够的热核武器从而对美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之前对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两小时的攻击行动结束后,“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之外”,苏联实际上将一无所有。随后一段时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几次向艾森豪威尔要求采取“积极”行动,主张应尽早挑起一场与苏联的战争。^③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即使发动一场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美国仍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战争势必会旷日持久,美国本土也可能遭受苏联的报复性打击,而且这一做法也不会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并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因而,美国开始转向考虑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即一旦获悉苏联即将对美国或其盟友采取行动,美国首先对其实施核打击,决不坐以待毙。艾森豪威尔强调,决不让苏联率先行动。肯尼迪总

① Daniel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 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p. 267; 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Spring 1983, p. 16.

② Kaku and Axelrod, *To Win a Nuclear War*, pp. 98-99.

③ David Rosenberg, “A Smoking Radiating Ruin at the End of Two Hours: Documents on American Plans for Nuclear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54-195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2, Winter 1982/1983, p. 25;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2-143.

统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美国要赶在苏联之前使用核武器。1962年3月31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将放弃从不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的原则，声称在某些情况下，一旦美国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将不得不主动出击。^①

但是，美国决策者很快认识到，即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美国仍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提出对苏联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计划，以摧毁其战略核力量，“解除”其武装。他们确信美国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彻底的第一次打击”，强调如果美国推迟行动，“机会之窗”就会关闭，就会坐失对苏联实施决定性核打击的良机。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威尔向肯尼迪建言称，现在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全面核战争不可避免的话，美国应该首先发起攻击”。根据美国制定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如果美苏爆发全面战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向苏联及其盟友的导弹基地、机场以及城市和工业目标投掷3423枚核弹头，苏联将损失54%的人口。^② 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苏联的核武器消灭殆尽，并确保美国不会遭受核报复。1961年9月13日，肯尼迪听取了军方拟定的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汇报。^③ 尽管他的一些顾问确信美国可以打一场有限核战争，但肯尼迪对此表示怀疑，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就很难控制住局势。^④ 在美国军方看来，即使爆发一场美苏全面战争，美国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能够存在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⑤ 但据兰德公司的评估，即使美国率先行动，苏联仍会有数架轰炸机逃脱美国的打击，从而对美国发动小规模报复行动，“在最好的情况下，造成200万—300万美国人死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的死亡人数达1000万—1500万”。如果苏联的打击目标包括美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这一数字还要高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229.

^② Fred Kaplan, "JFK's First-Strike Plan,"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88, No.3, October 2001, pp. 84-85.

^③ Scott Sagan, "SIOP-62: The Nuclear War Plan Briefing to President Kenned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1, Summer 1987, pp. 41-51;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69.

^④ David G. Coleman and Joseph M. Siracusa, *Real-world Nuclear Deterrence: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Westport: Praeger, 2006, p. 100; Kaplan, "JFK's First-Strike Plan," pp. 85-86.

^⑤ Paul H. Johnston, *From MAD to Madness: Inside Pentagon Nuclear War Planning*, Atlanta: Clarity Press, 2017, p. 208.

很多,甚至达2000—3000万。很显然,这是美国决策者无法接受的。^①

因而,肯尼迪政府更加注重核武器对苏联的威慑作用。1961年10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导弹差距”,美国拥有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少像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能力那样强大。他确信苏联不会挑起核冲突,倘若苏联发起攻击,“无异于自取灭亡”。一位助理国防部长则威胁说,在美国发动核打击之后,苏联将被夷为平地。^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几个场合向苏联发出威胁称,美国的核力量是苏联的数倍,在一场核冲突中,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所有目标。他在回顾这一时期美国的政策时强调,虽然战略核力量对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其“唯一的实际作用”就是阻止发生核战争或非核战争,因为在任何一场核冲突中,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取得胜利。^③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做好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各项准备。美国对古巴实施“隔离”行动后,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二级戒备状态。60架B-52轰炸机空中待命,其中52架携带着196枚核导弹。在地面,15分钟预警的飞机包括271架B-52轰炸机和340架B-47轰炸机,携带着1634枚核武器。136枚“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随时准备发射。1436架轰炸机和916架加油机随时准备迎战。美国的这些部署其实都是旨在威慑苏联,以阻止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④当然,苏联无意而且也在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双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形成了相互威慑。

长期以来,一些美国学者及曾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都过分夸大了美国战略核力量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将危机的和平解决视为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称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不仅享有“战术优势”,而且也具有全面的战略优势,美国利用所享有的压倒性优势迫使赫鲁晓夫让步,确信即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也根本无需担心苏联会进行报复,更不会触发一场核战争。在他们看

^① Kaku and Daniel Axelrod, *To Win a Nuclear War*, pp. 140-141; Rodric Braithwaite, *Armageddon and Paranoia: The Nuclear Confronta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7, p. 320.

^② Desmond Ball, *Politics and Force Levels: The Strategic Missile Program of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97; Richard N. Lebow and Janice G.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7.

^③ Edward Kaplan, *To Kill Nations: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Air-Atomic Age and the Rise of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3.

^④ Scott Sagan, *The Limits of Safety: Organizations, Accidents, and Nuclear Weap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5-66.

来,美国的核优势对于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①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鉴于当时的美国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对导弹基地发动空袭或入侵,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对于如何应对苏联的核打击,肯尼迪政府并无良策。1982年,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腊斯克及麦克纳马拉等人联名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强调“古巴导弹危机”表明,面对着可能幸存下来并将实施报复性打击的热核力量,核优势并非至关重要,而是无关紧要,美国的核优势并非决定性因素。^②美国的核优势并不能带来安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包括在古巴的导弹,苏联已经部署了50枚陆基导弹,100枚核潜艇导弹,还有150架远程轰炸机,在不管是哪一方发动的任何核交锋中,这些导弹和轰炸机中的一些将可能携带着数百万吨级的炸弹突破美国的防御,即使只有一枚导弹击中目标也将造成一场灾难,因而“我们对任何核交锋都没有兴趣,而是要避免它,我们自己的战略力量具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安逸”。^③麦克纳马拉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强调,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战略核力量同时确保自身不受大的损失将是极为困难的。他多次表示,尽管美国当时拥有5000枚核弹头,而苏联只有300枚,美国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同时保证自身完好无损。根据他的估计,即使美国率先发动进攻,苏联原有300枚战略核弹头中仍可能会有数十枚保留下来,足以对美国 and 欧洲大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数百万美国民众的丧生。^④应当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是美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

三、美国与核军备竞赛

作为威慑苏联的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政府都不断扩大核武库的规模,提高

^①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A. Welch, eds.,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pp. 147-148;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p. 235-236.

^② Jeffrey Porro, ed., *The Nuclear Age Reader*, New York: Knopf, 1989, pp. 168-170.

^③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 448.

^④ Robert McNamara, *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p. 8, 44-45; Paul Harper and Joann Krieg, eds., *John F. Kenned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8, p. 62.

核武器的质量,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由此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步步升级。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有拥有强大的核力量才能对苏联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阻止其发动战争,维护美国及其西欧盟友的国家安全。

1949年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不啻是当头一击,极大地加剧了其不安全感。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研制比原子弹更具威力的氢弹展开激烈争论。国务院顾问凯南建议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认为美国如果此时决定研制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其结果必然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进而根本改变遏制战略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①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小组强调,研制氢弹的做法是错误的,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极大的危险。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知名科学家也都对由此导致的美苏军备竞赛的升级感到忧心忡忡。^②但是,美国军方认为,为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应尽早展开研制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提出报告称,“苏联对这种武器的独占,不仅会给我们的军事态势,而且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地位将造成严重损害”。杜鲁门表示,既然苏联可能会研制这种武器,他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行动,认为就氢弹而言实际上没有决定可做,尽管没有人想使用这类武器,但美国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为了与苏联讨价还价。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氢弹的研制直接关乎美国的对苏政策和国家安全。因而,这一工作成为当时美国“最为急迫的事项”。^③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加快了原子弹的生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警告说,一旦拥有了可以打击美国的核能力,苏联就可能先发制人,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从而给美国的工业和城市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只有尽快增强自身的核力量才能阻止其行动。1950年,美国拥有298枚原子弹,1952年为832枚,1953年增至1161枚。^④

1957年11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次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度恐慌。美国对苏联核力量的发展深感震惊,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导弹差距”。当时的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在远程导弹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美国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战略优势,苏联的导弹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使美国处

^①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0, Vol.1. Washington, D. C. : GPO, 1977, p. 39.

^② Barton Bernstein, “Truman and the H-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 1984, p. 13.

^③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80.

^④ Ojserkis,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p. 143.

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苏联在核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并提出对策。不久,该委员会提出报告,称在研制洲际导弹方面苏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将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加快战略核力量的建设步伐。这一报告无疑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了影响,美国的核力量由此有了大幅增长。核弹头由1957年的5000枚增至1960年的1.6万枚左右,并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部署了中程导弹,直接威胁着苏联的欧洲地区。

尽管肯尼迪执政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导弹差距”并不存在,美国依然享有较大的核优势,但他仍加紧发展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以维护并确保在核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地位。肯尼迪认为,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全面冲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扩大军备。他甚至考虑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行动。^①

据估计,1962年美国拥有各类核武器2.7387万件,而苏联只有3322件。^②美国拥有洲际导弹254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30架;而苏联则分别拥有56枚、24枚和159架。在战略武器方面,美国大约领先苏联10年。但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不断强化核力量的建设,双方之间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平衡。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战略核弹头4000枚。苏联则分别拥有1200枚、230枚、150架和1700枚。^③

在里根政府看来,这种战略平衡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为了应对苏联不断增长的战略实力,美国将其核力量的现代化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里根政府提出了战略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旨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从而打破与苏联的核僵局,重新获得核优势。根据里根签署的国家安全指令第13号,核武器在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阻止其他国家发动进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威慑不能奏效,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美国必须占据优势,并迫使苏联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战争。为此,美国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加紧研制洲际导弹,以增强美国的威慑力量;另一方面,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将军备竞赛引向太空。

^① Robert Dallek,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3, p. 347.

^② “Nuclear Notebook;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6,”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62, No.4, July/August 2006, p. 66.

^③ 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126.

四、缓和与核军备控制谈判

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不仅使美苏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在核时代,一旦发生美苏全面战争,其后果不可想象,不仅美苏两败俱伤,甚至将给整个人类文明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因而,核军备控制谈判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苏首先就核禁试问题在日内瓦展开谈判。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是极为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并试图通过谈判限制苏联核能力的发展,维护美国的核优势,致使会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古巴导弹危机”既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产物,同时也推动了双方的核裁军谈判。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使美国决策者切实感受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因而核战争是绝对要避免的。这场危机表明“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① 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应该道出了两人当时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在他看来,一个各国彼此以核武器相威胁的世界不仅是“无理性的”,而且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思议的”,整个人类在防止核战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1963年6月10日,他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讲话时强调,核时代爆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制止军备竞赛方面美苏有着共同的深切的利益,宣布美国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并谋求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这篇讲话被赫鲁晓夫誉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所发表的最好的一篇演说”,他显然深有同感。^②

“古巴导弹危机”开启了较为缓和的美苏关系的新时期。一些学者将这一事件视为“冷战的转折点”。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认为,这场危机“是冷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核战争的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30年里,“古巴

^① 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Longman, 2005, p. 143.

^② Theodore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 725; Dan Caldwell,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1947 to the Nixon-Kissinger Grand Desig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1, p. 58; Dallek, *An Unfinished Life*, p. 621.

导弹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险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①

美苏关系缓和的一个具体成果是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的目的是为“尽速达成一项在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协议”,制止军备竞赛和消除刺激生产和试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因素;“谋求永远不继续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希望使人类环境不再被放射性物质污染”。^② 尽管该条约未禁止地下核试验,以便两国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这是自1945年核武器出现以来美苏在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要一步,并为日后双方在该领域进一步谈判并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968年7月1日,美苏签署《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确定有核缔约国不得将核武器让与任何其他国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无核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控制权;无核缔约国承诺不得拥有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防止将原子能自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缔约国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进行谈判。应当说,尽管美苏签署该条约的意图在于阻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但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苏关系缓和的重要标志。应当说,约翰逊政府在核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为这一谈判进程的开启奠定了基础。^③ 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表示愿意就战略武器问题与苏联谈判。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联系”政策,认为战略武器谈判只有在能促进重大政治问题取得进展时才能举行,试图利用谈判迫使苏联在其他问题上相应地做出让步。尼克松认为,与肯尼迪政府相比,他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制定对苏政策的,因为肯尼迪时期苏联只有80枚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导弹,并且需要准备10分钟才能发射,而他面对的却是苏联可立即投入使用的1000枚洲际导弹。^④ 1969年10月,双方就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至1972年5月先后在赫尔辛基和

^① Leffler and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1, p. 397;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3, p. 71.

^② 《国际条约集(1963—1965)》,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6—208页。

^③ Hal Brands, “Progress Unseen: U. S. Arms Control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Détente, 1963-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2, April 2006, pp. 253-285.

^④ Francis Gavin, *Nuclear Statecraft: History and Strategy in America's Atomic A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1.

维也纳举行了7轮谈判。美国要求把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作为谈判的内容。其基本意图是：将反弹道导弹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联系起来，用限制美国在反弹道导弹上的优势来换取削弱苏联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上的优势，遏制苏联陆基洲际导弹尤其是重型洲际导弹的发展，冻结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而同时保持住美国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对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美国主张限制在美国已拥有的1710枚水平上，进行对等削减，并冻结轰炸机的数量，美国为527架，苏联为195架。美国提出的另一方案为进行大幅度削减，每年减少100枚，到1978年降到1000枚。美国把限定的目标对准了苏联占有优势的陆基导弹，特别是重型导弹，限定为250枚。苏联则要求限制一切能打击苏联领土的核武器。

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讨价还价，美苏终于达成妥协。1972年5月底，美苏领导人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临时协定主要是将两国武器库中进攻性导弹的数量冻结5年，确定了双方战略武器的限额分别为美国1719枚，苏联为2358枚；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美苏分别可拥有1054枚和1618枚；潜射导弹方面美苏分别为710枚和950枚；美苏分别拥有可发射导弹的潜艇为44艘和62艘。两国领导人表示，保证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继续进行积极谈判。1973年6月，两国又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确定双方将在一年内努力制定并签署一项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永久性协定。

福特政府继续奉行对苏缓和政策，谋求推进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4年11月，福特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工作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愿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署一项有效期至1985年底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规定双方拥有的进攻性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各为2400枚，其中可以携带多弹头的分导式导弹的数量不超过1320枚。由于双方在战略武器的限额、定义、核查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美国政府认为苏联有可能为达成协议而继续做出让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致使谈判步履维艰，未能签署协议。^①

卡特政府将限制核军备竞赛作为对苏政策的首要任务，认为此举符合美

^① John Newhouse, *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pp. 249-250; Tal, *US Strategic Arms Policy in the Cold War*, pp. 179-180.

国的最大利益。在其就职演说中,卡特表示“要为实现从地球上消灭核武器这一最终目标而努力”,强调要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同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希望以此来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执政伊始,卡特提出了有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建议,并希望尽早举行首脑会晤。与此同时,卡特设立了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官员组成的研究与决策机构,主要评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具体问题。1979年6月18日,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议,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确定至1981年底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限额各为2250件,并对带有多弹头的巡航导弹、陆基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数量分别作了限制。^①

里根执政后,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要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存在着严重分歧。包括里根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一条约允许苏联保留重型陆基导弹,没有限制导弹弹头数量和重量,并将苏联逆火式轰炸机排除在外,而美国核力量的发展却受到了限制,因而存在“严重缺陷”。这使得里根在核裁军问题上态度极为消极,甚至要取消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恢复美国的核优势。

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底,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冻结核武器”运动,扩展到40多个州,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反响。1982年3月,100多名国会议员提出联合决议案,要求美苏冻结现有核武器,停止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部署。凯南、麦克纳马拉、麦乔治·邦迪等前政界要员也都认为,美苏已处于核战略均势地位,美国必须改弦更张,避免与苏联迎头相撞,裁减核军备,这样有利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同时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赤字。

在此情形下,美国决定与苏联就核裁军举行谈判。1981年11月18日,里根就战略核武器和军控问题发表讲话,建议美苏共同削减常规力量、中远程核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尽早进行谈判。他还两次致函苏联领导人,希望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展开磋商。^②1982年6月,美苏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谈判开始在日内瓦举行,至1983年10月,双方进行了5轮会谈。美国提出的方案是首先应将美苏战略导弹的弹头削减1/3,双方拥有的弹道导弹弹头减至5000枚,其中陆基导弹弹头不超过1/2,即2500枚;其运载工具在今后5至

^① Ambrose, *The Control Agenda*, p. 142.

^② Jeffrey Chidester and Paul Kengor, eds., *Reagan's Lega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5-156.

10年内各裁减至850枚。据此,苏联需要削减陆基导弹弹头3000枚,削减导弹1550枚,而美国则只需削减陆基导弹850枚。第二阶段在战略武器的其他方面达到均等限额,其中战略导弹的投掷重量限制在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上。这一方案显然旨在限制和削弱苏联陆基导弹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加紧推进“战略防御计划”。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会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欧洲中程武器会谈是美国核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先进的SS-20中程导弹,射程达5000公里,这一部署使欧洲的核力量对比出现了不利于北约的变化,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担忧。1979年12月,北约成员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共同参加的布鲁塞尔特别会议通过“双重决议”,确定由美国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使北约的战区核力量现代化,同时要求美国与苏联尽快举行限制和削减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如果到1983年底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届时将开始在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分阶段部署572枚新式中程导弹,其中包括464枚陆基巡航导弹和108枚潘兴II型导弹,以此来打破苏联在中程核武器方面所享有的优势。

1981年11月,美苏关于限制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在日内瓦开始,至1983年11月共进行了111次会谈。美国首先提出所谓“零点方案”,即如果苏联拆除其部署在欧洲的所有SS-20、SS-4和SS-5中程导弹,则美国将放弃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1983年3月和9月,美国又先后提出“临时协议”方案和“逐步削减”方案,均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美国认为美苏在欧洲的中导力量是不均衡的,苏联具有绝对优势,已经部署了240多枚SS-20导弹,因而,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相应的导弹。如果苏联拆除其导弹,美国才会放弃部署计划。而在苏联看来,双方已经在中程核武器方面达成了均衡。其二,关于裁减中程核武器的种类。美国主张谈判应限于苏联已部署的SS-20、SS-4、SS-5等导弹和美国准备部署的潘兴II型和陆基巡航导弹。苏联则坚持要求裁减所有中程核武器,包括美国的“前沿基地系统”。其三,对于英国和法国核力量是否应纳入谈判范围。美国强调英、法是主权国家,美国无权代表其进行谈判。而苏联认为,英、法核力量是西方在欧洲中程核力量的组成部分,打击目标同样是苏联,应该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此外,双方的分歧还包括裁减的限额和计算方法、裁减中程核武器涉及的地理范围、中程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谈判之间的关系等。^① 1983年11月,美国根据北约“双重

^① 王洋主编:《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第96—97页;顾德欣:《核裁军史》,第203、209页。

决议”将第一批巡航导弹运抵英国,同时准备在欧洲部署潘兴 II 式导弹,导致苏联退出谈判。

里根的对苏政策自第二任期开始出现变化,表示愿意恢复中断一年多的核裁军谈判,并多次发表讲话,称不会再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优先考虑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改变了对苏态度,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核力量方面,美苏重新达成“恐怖的平衡”,美苏缓和有助于缓解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1985 年美苏分别拥有战略核弹头 1.12 万枚和 9900 枚、远程导弹 1023 枚和 1398 枚。里根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和国债激增,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苏联对美国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努力缓和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军备谈判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核裁军从“限制”阶段迈入了实质性的“削减”阶段。

1985 年 11 月和 1986 年 10 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先后在日内瓦和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核战争是打不赢的,应该永远不打核战争,双方决心防止双方之间的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不谋求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两国基本达成一致:今后 5 年双方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一半;10 年内销毁双方拥有的所有进攻性洲际弹道导弹;销毁各自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冻结双方在欧洲的短程导弹数量;减少并争取停止一切核试验。但是,双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分歧一如从前。里根坚持认为美国无意寻求战略优势,“战略防御计划”旨在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强调决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①而在苏联方面看来,美国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的核军备竞赛。尽管如此,双方的分歧并未影响中程武器谈判。1987 年 12 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会晤时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规定两国应在条约正式生效后立即停止所有射程为 500—5000 公里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生产和试验;三年内应销毁双方所有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包括已部署和未部署的导弹、弹头以及发射装置、辅助设施等;条约生效 18 个月以后,双方都不得再有中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等;三年后双方不得再有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等;今后双方不得生产、试验和部署任何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据此,美国将

^① Raymond L.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p. 286-290.

销毁 859 枚导弹,苏联销毁 1752 枚导弹。^① 虽然条约规定的销毁的两种导弹只占两国核武库很小的一部分,但这是美苏达成的第一个裁减核军备的协议。经过数年的艰难谈判,1991 年 7 月,美苏领导人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双方在核裁军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核武器各削减 30%,各自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包括陆基洲际导弹、潜艇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总数削减至 1600 件,苏联所拥有的重型洲际导弹不超过 154 枚;双方部署的核弹头各为 6000 枚,其中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总数不超过 4900 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不超过 1540 枚。美苏签署的这些条约有助于推动双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与冷战的结束。

结 语

通过前面极其粗浅的梳理,可以看出,核武器在战后美国对苏政策和美苏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核武器作为对苏政策的工具。战后初期,美国将苏联视为最大的威胁,一方面对苏联实施核讹诈政策,另一方面又试图采取包括发动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阻止其拥有核武器。美国决策者终究还是奉行了较为现实的政策,并转向以威慑为主,旨在以强大的核力量阻止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行动。

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愈发担心苏联可能的突然核打击。为谋求战略优势,增强对苏联的威慑力,美国不断强化核力量,导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核军备竞赛的产物,将世界带到一场核战争的边缘。应当说,核武器在美国对苏政策中并未起到美国决策者所幻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反而使自身屡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鉴于核军备竞赛使双方的战略力量达成了“恐怖的平衡”,不论是发动第一次打击还是第二次打击,美国都将遭受难以估计的破坏,而且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也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而,限制核军备竞赛谈判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中的核心内容,并构成双方关系缓和的基本特征,由此也促进了冷战的结束。

^① Ronald E. Powaski, *Return to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1981-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9.